

# 习近平“确立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论断的深刻蕴涵与重要创新<sup>\*</sup>

裴学进

---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就坚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提出很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本文阐释了习近平关于确立“价值观最大公约数”论断提出的现实基础，从价值哲学层面揭示了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重要创新：把人民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把“增进人民幸福”列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旨归，把“认同”提升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把“异中求同”增列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维方式等。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哲学

**作者简介：**裴学进（1974-），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sup>①</sup>这个论断包含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深刻的学理蕴涵，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重要创新。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角度全面阐释这一重要论断。这既是完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新时代我们深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迫需要。

## 一、提出这一论断的现实基础

“要使某一社会价值观念在个体的认同中发生作用，就要使该价值观念所体现出来的利益意识的变化与个体价值观念所体现出来的利益意识变化高度吻合。”<sup>②</sup>把这一观点进行普遍化的提升就是，要使某一种社会价值观念与民众相结合且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就要选择与他们的主体意识与利益意识特点相契合的实现方式。就我们的论题来说，至今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有20余年，人们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而主体意识和利益诉求日趋增强，这是习近平提出这一论断

---

<sup>\*</sup>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贡献研究”（19BKS176）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sup>②</sup> 陈新汉：《核心价值体系论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9页。

的现实基础。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①</sup>，“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sup>②</sup>。伴随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个体主体意识和利益诉求也随之改变。马克思以人和经济形态为中心，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分为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sup>③</sup> 伴随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形态发展到商品经济形态，民众主体意识和利益诉求的显著增强，由此可以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把握习近平提出这个论断的现实基础。

最初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在此经济形态社会中，个体是通过地缘或血缘结合为群体而存在的。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里，个体的力量比较微弱，只有结合为群体，并以群体方式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于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群体。最早的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氏族等。在这个阶段，个体基本是处于群体组织的支配之下，个体的主体性主要是从属于、依附于其所属群体的（如公社、单位等）。“群体支配个人的一切，体现人的主体性的是群体。”<sup>④</sup> 于是“非独立性、依附性就成了人存在的常态”<sup>⑤</sup>。因而在此阶段里，民众主体意识的主要导向是群体意识，相应地，个体意识也就比较薄弱。人们通常对利益的追求也主要局限于衣、食、住、行等基本方面，往往是有限的，因而个体利益诉求也是不突出的。

第二阶段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即以商品经济作为基础的社会。因为在商品经济形态的社会里，商品或者货币的所有者个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建立的，因此个体在根本上脱离了群体的限制，挣脱了往日那种来自群体的人身束缚和依附，达到了用对“物”的依赖关系替代以前对“人”的依赖关系，于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也就随之逐步生成了。

市场经济遵循着商品经济活动的普遍规律，因此“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主体地位从必然受动走向相对主动的进程。相对于自然经济，这是人的主体地位在经济物化王国中的真实确立”<sup>⑥</sup>。“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通过财富的物化关系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价值观念中个体主体意识的凸显。”<sup>⑦</sup> 与之紧密相伴的是，由于商品以及作为其固定等价物货币的出现，民众追求利益也就从以往对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事物的有限追求转化为对货币的不断追求，而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sup>⑧</sup>，即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不受限制的，由此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对货币的无限追求就表现为对以货币为中介的利益的追求没有止境，这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利益诉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④ 陈新汉：《核心价值体系论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⑤ 李金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和谐社会价值建设》，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⑥ 范传鸿、颜杰：《人的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底蕴》，《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⑦ 陈新汉：《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导向中几个问题的哲学思考》，《学术界》2016年第10期。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0页。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 多年后的今天，民众的主体意识与利益诉求日益凸显。而民众这种凸显的主体意识与利益诉求表现于价值观培育实践中，呼唤我们在注重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也要选择兼顾民众发展的“认同”作为培育社会价值观的基本路径。因此就当前现实情况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主要是“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制度精神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并使之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sup>①</sup>。当然，这只是侧重点有所区别，是相对来说的，而不是绝对而言。

## 二、这一论断的深刻蕴涵

习近平这一论断包含四层有机联系的蕴涵：一是人民是历史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论断中三次提到“人民”，即“人民认同”“使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尤其强调了认同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关键作用。二是内蕴着“异中求同”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方式。三是形成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四是得到群众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步、人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与之相应，其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指导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1. 牢固树立人民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的思想

一方面，更加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与其他阶级社会相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sup>②</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确立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奠定了根本保证，提供了广阔舞台，所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sup>③</sup>。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力量。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要更加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紧扣“依靠人民来创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伟业”这个根本遵循，及时完善制度、健全体制机制。“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sup>④</sup>从而把人民的主体作用更加充分展现出来，内蕴的潜能尽快释放出来，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认同、广泛共识、深度信仰，增强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坚定性。达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不断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向前进。

### 2. 运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里的“同”和“异”都是有具体所指和特定内涵的，而不是泛泛而论。具体来说，“同”就是指寻求更多民众的共同认同，最终以“最大公约数”形式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异”就是广大民众在共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认可的以“非公约数”形式存在的其他价值观，现从主体活动和结果两个方面作分析。

其一，在引导民众普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容许民众认可其他价值观。具体说来，就是要尽量引导更多的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整个社会就缺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① 侯惠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上如何取得共识？》，《红旗文稿》2012年第8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在这个基础上，尊重民众在遵守社会秩序范围内选择其他价值观。如此，民众既共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各自选择了其他社会价值观。因而作为社会价值观选项，与其他社会价值观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为最多民众的共同选项。

其二，要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阶段，在民众的价值观中形成共识部分核心价值观和非共识部分其他价值观共存，即在民众的价值观组成中形成以下图景：一部分是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后形成个体共同的价值观，即共识部分的价值观（就是作为“最大公约数”部分的价值观）。此时这个达成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普遍性形式存在于更多个体意识中。另一部分就是民众基于自身因素而认可某些部分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彼此之间是相异的，属于非共识部分的价值观（即作为“非公约数”部分的价值观）。

上述两个方面是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运用“异中求同”思维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引导广大民众共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也尊重他们认可其他社会价值观，这是从主体（活动）角度来体现“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而在个体内部价值观结构中形成的“同”（共识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异”（非共识部分其他价值观）并存，是从活动结果的角度来体现“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民众经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其他价值观认同、选择之后，必然要把价值活动的结果凝结在自己的价值观结构中。而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以及由此而决定价值观内部结构的组成来源于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不同选择活动。前者主要指向民众的价值活动，即“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谁”；后者则指向作为活动结果的最终存在方式，就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果以何种方式存在”。其实上述两个方面是运用“异中求同”思维方式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sup>①</sup>。

### 3. 引导、寻求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信仰

其一，就是寻求越来越多的、力求达到“最大多数”民众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总体设计，即在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不仅要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勠力同心、奋力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还要使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仅要引导、寻求越来越多国内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适时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延伸到更大空间，争取更加广泛的民众来认同、认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扩大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内能够凝聚人心，对外能够吸引世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sup>②</sup>，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价值引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为解决人类价值认知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其二，在寻求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将之积淀成信仰。按照分类指导、分层推进的步骤，要坚持先进性和普遍性的统一，首先要推进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多群体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这里的“带头”主要是针对干部要在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方面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而提出的要求。

其三，寻求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过程。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并不意味着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

② 陆卫明、曹芳、吕菲：《论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闻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个工作结束了。而是要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要求，不断引导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保持对人民的敬畏意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因此，能否不断寻求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将之积淀成“信仰”，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集体意志”就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sup>①</sup>而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程度上的深浅决定着其感召力的强弱和大小。因此，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不断探索的持续过程。

#### 4. 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然得到群众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步、人民幸福具有重要作用，其隐含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民众认同和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新时代的语境来说，就是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角度来推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眼点”，它的深层次意蕴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中轴而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更加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实现其历史性变革。

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从国家战略高度就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其他重要观点，如把它提升至“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高度。在纲领层面将之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此外，还将之纳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部署。后来又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写入党章和宪法修正案之中，这些都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举措，也是使该论断的蕴涵进一步法规化的体现。

### 三、这一论断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重要创新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sup>②</sup>。习近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sup>③</sup>当作“思想材料的前提”，立足于新时代需要，以“思想家的深刻洞察力、理论创造力”，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重大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提升到新的境界，坚定和增强了我们的价值观自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有效应对、超越“普世价值”。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具体表述上不是以现在的“核心价值观”“培育核心价值观”等形式，而是以其他形式来表达的，如“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调节思想生产和分配”等，但在本质上是接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价值以及价值问题的专门论述，但其文本中却内在地蕴涵着丰富的价值思想。”<sup>④</sup>“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关于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关于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关于无产阶级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③ 在本文中“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指在最普遍、一般意义上即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而不是指他们针对某一具体领域、特定语境所提出的价值理论（如劳动意义价值论、商品交易活动中的价值论等）。

④ 王燕群、吴倬：《马克思价值思想及其当代现实意义》，《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

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特别是关于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都有过诸多论述，在这些论述和文献中，存在着许多关于价值论的思想。”<sup>①</sup>

### 1. 把“人民”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sup>②</sup> 这表明，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是占统治地位思想的主体，而核心价值观是占统治地位思想的“内核”，也就提示了统治阶级是核心价值观的“主体”。这是在此前关于占统治地位思想主体（也即核心价值观主体）的基本认知。习近平在此论断中首次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各族人民”，从而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主体相结合。因为“确立人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特定领域中的具体展开，实现了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价值主体的真正统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盈着丰富的人民性，而与历史上的情况形成根本区别。

### 2. 把“增进人民幸福”列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旨归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sup>③</sup> 而思想（包括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是紧密联系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④</sup>。这就决定了作为占统治地位思想“内核”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之旨归在根本上来说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而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因此，培育核心价值观之旨归根本在于巩固统治阶级利益。“在阶级社会里，‘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生产和再生产”<sup>⑤</sup>。也就必然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即把促进人民幸福、安康排除在培育核心价值观根本旨归之外。“大多数的意识形态都是外部导向的。意识形态通常将某个社会人群的福祉与该人群所处的世界的环境相提并论，因此这个世界必须加以改造，以使它符合某一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需求与处境。”<sup>⑥</sup> 因此，此前在客观上是把培育核心价值观根本旨归主要局限于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的发展之内。

而在此论断中，习近平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发展上首次明确把促进“人民幸福安康”列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旨归之中。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新论述，从新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该论断中所凸显的上述意涵。

### 3. 把“认同”提升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

回顾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灌输”作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列宁的“灌输理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sup>⑦</sup>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马克思在1875年批评《哥达纲领》起草者歪曲了“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

① 马俊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⑤ 李金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和谐社会价值建设》，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

⑥ [美]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1页。

⑦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根的现实主义观点”<sup>①</sup>。恩格斯也曾指出：“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sup>②</sup>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延续了这一传统，在不同场合多次论及“灌输”。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sup>③</sup>江泽民也指出：“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不断灌注到并真正深入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的头脑之中。”<sup>④</sup>

习近平在此论断中，把“认同”提升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之一，实现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路径从“灌输”扩容为“灌输”和“认同”。其内在依据是，相比较而言，以认同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隐含三层含义：体现出对民众主体地位的更加关照，对民众基本利益的更加关怀，对民众发展的更为关切。

#### 4. 把“异中求同”增列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维方式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sup>⑤</sup>具体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和“实践”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20余年后，民众精神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习近平准确把握这个“时代”和“实践”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新要求，首次明确把“异中求同”增列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发展历史上，实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新突破、新拓展。

马克思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时，曾经形象地指出：“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sup>⑥</sup>。在这里“马克思把当时意识形态称为‘精神太阳’”<sup>⑦</sup>。可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这句话以另外一种方式指明了当时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思维方式为“以一统多”。而习近平在此论断中首次提出了“异中求同”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维方式，因此他在继承以往思想的基础上，拓展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保留传统思维方式和创造符合新时代要求思维方式的统一，使我们具备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整思维方式，从而在这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关于运用“异中求同”思维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也是有前期基础的。他曾经指出：“我们也要看到，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大家会有不同想法。那就要考虑，哪些是可以‘求同’的？哪些是可以经过做工作形成或转化为共识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存异’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功倍。”<sup>⑧</sup>可以看出，用“异中求同”思维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求同存异”思维方式形成对改革开放共识在方法论上是一致，但又对后者作了提炼和升华。

习近平这一论断所包含的上述四个方面创新在逻辑上是紧密相连的，其中第一方面，把“人民”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是根本，也是基础，第二方面，把增进人民幸福列入培育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1页。

④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⑦ 陈新汉：《核心价值体系论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⑧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旨归是关键，第三、第四方面则是前面两个方面在不同层次的实现方式。具体来说，第三方面主要是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方式层次，而第四方面则主要是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方式的层次来体现前两个方面。因此，没有第一方面作为基础，第二方面也是无本之木，但如果仅仅有了第一方面，而没有后面的三个方面，则第一个方面也就是纯粹的抽象之物。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过多年探索后，目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且已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安排之中。另外，《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列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把“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纳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部署之内，包含在“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部分<sup>①</sup>。这些论述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从而回答了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我们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取得与新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伟大成果，从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 参考文献：

- [1] 李崇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 [2]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红旗文稿》2017年第21期。
- [3] 张建刚：《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红旗文稿》2018年第10期。
- [4] 陈新汉：《认同、共识及其相互转化——关于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的哲学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 [5] 马俊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 [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 [8]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编辑：张晓敏)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